

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——

不断发展壮大的华北要冲

■万德生 周一

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,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一块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。从地理位置上看,它基本位于陇海路以北、正太路以南、汾河以东、津浦路以西,是一个横跨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五省的巨大梯形区域。在根据地范围内,又可以分为以山地为主的西半部和以平原为主的东半部,并由此形成了太行、太岳、冀南、冀鲁豫4个主要的组成部分。

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除了因为拥有较大的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、较多的人口数量外,其与周边主要交通线和其他根据地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由于此根据地与华北地区多条重要的铁路、公路交通线相邻,我军从任何一个方向出击,都可能对华北日军的兵力调动和后勤补给造成很大威胁。此外,根据地西接晋绥、北邻晋察冀,东靠鲁、苏,与其他几个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互为唇齿,是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枢纽地带。

根据地内山岳丛林、平原河网交叉分布,群众基础较好,便于我军实施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。1938年10月,广州、武汉相继失守,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,华北敌军也将进攻重点对准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,开展大规模“扫荡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党为统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行动,先将太行、太岳、冀南合并,成立冀太联办,统一了晋冀豫区;随后,又将冀鲁豫和鲁西合并,成立新的冀鲁豫区。至此,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巩固壮大的条件基本成熟。

成立边区政府,整训主力兵团

经过1年多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,八路军第129师在取得显著战果的同时,也暴露出部队官兵技术水平偏低、指挥员筹划指挥和组织协调能力不足等问题。为此,师首长决定利用1941年这一年的时间,开展对主力兵团的整训工作,旨在夯实部队的作战基础,为下一步的战斗行动创造有利条件。

此次整训主要分为3个方面。第一,组织团以下官兵,尤其是基层连队战士的基本战斗技能集训,重点对刺杀、格斗、射击、爆破等内容进行深入学习和反复训练,提高单兵战术水平。到1941年11月,除少数仍在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外,全区大部分主力兵团均已完成集训,战斗力水平大幅提高。第二,强化组织建设,大量发展党员,并开展“创造模范支部、模范党员、模范干部”的运动。在运动中,各旅、团纷纷组织党支部书记、委员和党小组长集训,组织学习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基本政策,提高大家的思想水平,进一步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



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开展军政大整训。资料照片

作用,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。第三,对部队构成和隶属关系进行调整,着力充实基层连队的战斗力量,拓展主力兵团的后备力量。在调整过程中,各部队大多采取“机关下连”和“垂直指挥”的方法,一方面,把机关的大批青年官兵调入基层连队,另一方面,对于损失过大的连队不再设排,损失过大的团不再设营部,由团直接指挥几个战斗连队,整体战斗力和指挥效率都有所提升。

经过1年的整训,晋冀鲁豫边区的主力兵团、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作战能力都有所增强。与此同时,为了适应更为严峻的斗争形势,统一抗日根据地的各项行动,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下,冀太联办于1941年3月召开临时参议会,选举产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。随后,又在7月将鲁西33个县划入本区,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。从此,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有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,根据地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
坚持敌后抗战,有力震慑敌伪

1941年12月,日军偷袭珍珠港,挑起太平洋战争,也由此带来了亚太地区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巨大变化。一方面,美、英等国家加入反法西斯阵营,与我国军队在多个战场形成实质上的同盟关系;另一方面,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持其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,更加迫切地需要巩固中国“占领区”,从而可以抽调更多兵力支援其他方向作战,并从我国掠夺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。从1942年3月起,华北日军推行第四次“治安强化运动”,对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加疯狂的“扫荡”和经济掠夺。

1942年5月中旬,日军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太行、太岳地区发动夏季大“扫荡”,即所谓的“C号作战计划”。

在这次“扫荡”中,日军除沿用之前的“梳篦”“清乡”“三光”等方法外,还派出大量日本特务人员伪装成八路军“挺身队”,在伪军和汉奸的帮助下深入我军纵深,直接奔袭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的重要指挥所,对我根据地的党、政、军首脑机关造成严重威胁。

在探明敌情之后,根据地军民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,有针对性地展开各项战斗准备工作。他们首先进行紧急动员和轻装,做好随时进行转移和长距离机动的准备,并在敌人可能进犯的道路上设置大量秘密情报通信哨所,由军区派出干部指挥地方党政机关和民兵驻守,构建了灵敏高效全天候的敌情预警网络。与此同时,我军利用敌军大举出动、后方空虚的弱点,广泛开展了外线作战,重点打击敌军的交通线和外围据点,并大力实施政治攻势,打击伪政权和汉奸,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力,有力震慑了各种反动武装。

至1942年7月,仅太行、太岳两区就捣毁敌人扶持的“维持会”1000余个,我军主力部队不仅在多地击退敌人的进犯,还掩护了多地的复收、征粮、政权建设等工作,反“蚕食”、反“扫荡”斗争取得显著效果。

明确战略任务,发动春夏攻势

1945年初,根据中共中央“扩大解放区,缩小沦陷区”的指示,晋冀鲁豫各军区在八路军总部的具体指导下,制订了1945年的作战计划,主要目标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,发展扩大根据地,并打通

华北与华中的联系。据此,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逐步展开声势浩大的春季、夏季攻势作战。

此次春季攻势,从攻克大名县城开始。由于之前已进行较充分的争取工作,在战斗开始后,驻守大名城内的伪军几乎全部反正,配合我攻城部队夺取县城。随后,为打通太行和豫西地区的联系,太行军区决心发起道清战役,重点扫清道口、清化铁路两侧的敌占区域。1945年1月下旬,战役第一阶段开始。太行军区出动主力部队4个多团,奔袭小东、宁郭镇之敌,战至31日,接连攻克敌军据点10余处,巩固了我军在道清铁路以南开辟的新区域。2月20日,战役第二阶段开始。我军先后对赵固、峪河、百泉等敌军据点发起猛攻,至3月6日攻入辉县城关,基本解放了铁路以北除辉县县城外的其他地方。在我军持续攻击之下,日伪军被迫收缩兵力,据守获嘉、辉县等几处孤立的县城,由此造成新乡、郑州、开封之间兵力空虚、防御薄弱。我军主力抓住这一战机,采取远距离运动开赴的方式,以原武、阳武为中心展开作战。至4月1日,道清战役胜利结束,不仅解放了大量人口,还建立了4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,使豫北、豫西一带的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。

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,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。会上,毛泽东同志向大会提交《论联合政府》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,朱德同志作《论解放区战场》军事报告,全面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,为下一步开展战略反攻提出具体任务和措施。大会精神鼓舞了晋冀鲁豫,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大受鼓舞。在前一阶段春季攻势的打击下,敌军已将防御重点集中在几个大城市,加上抽调兵力补充其他方向,致使其兵力大幅减少。在此有利形势下,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先后发起春季攻势,安阳战役、成安战役、阳谷战役等一系列进攻作战,基本肃清根据地范围内的日伪武装,打通多条重要的铁路、公路交通线,解放区范围进一步扩大,人民武装力量进一步增强,为开展更大规模的全面反攻奠定基础。

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,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,充分发动群众,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,以号称“天下之脊”的太行山脉为依托,解放和巩固了华北平原的广袤地区。至抗战结束时,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共计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,并将主力部队发展至30万人、民兵发展至40万人,成为我党领导的一支实力强大的重要力量。



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



链接历史

来安城位于津浦铁路南段东侧,是苏皖边境敌我争夺的一个要点。日伪军曾对路东进行深入“扫荡”,并几次企图占领来安城,以此作为津浦铁路南段交通安全的东部屏障。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,新四军第5支队在司令员罗炳辉率领下,3次攻打侵占来安城的日伪军,取得“三打来安城”的重大胜利,极大鼓舞了皖东军民的抗日斗志,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,使其不敢再轻易来犯,同时为巩固和壮大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。

一打来安城,公路巧设伏

1939年5月,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2营和战地服务团一部,率先越过津浦铁路,在盱眙、天长、来安一带进行侦察。7月,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,扩编成第5支队,罗炳辉担任司令员,郭述申担任政治委员。第5支队成立后,以第8团3营作为先头部队,立即向皖东津浦路东地区挺进。8月,罗炳辉、郭述申率第8、第15团和支队机关相继到达津浦路东。不久,第10团也进入津浦路东,全支队在来安、天长、盱眙、嘉山、仪征、六合等地展开。

9月3日,驻滁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3旅团步兵第65大队一部及伪军共300余人向来安县城进犯,企图以来安为依托,切断津浦路两侧新四军部队的联系,逼迫第5支队退回津浦路西。

罗炳辉获悉敌情后,立即组织支队干部研究,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,先发制人。他命部队在来安西南、西北的大路两侧展开,占据有利地形,准备以伏击战法打击敌人。当天下午,从张八岭出动的日军1个大队、伪军2个大队向来安进发。当敌军进至伏击地区,随着罗炳辉一声令下,第5支队第8团等部三面夹击,打得敌人措手不及。

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。摸不清新四军实力的日伪军,不敢久战,连夜躲进来安城。当晚,罗炳辉命第10团侦察排身穿便衣,半夜摸进城内,在日伪军驻地分别袭扰一阵后迅速撤出。日伪军白天摆兵将,晚上又遭偷袭,慌乱之中竟自相交火。

由于在白天和夜间的连续战斗中遭受重创,加之增援部队迟迟未至,惶恐不安的日伪军于次日中午弃守来安县城,向滁县方向溃逃。溃退途中,其残部遭我第8团伏击,伤亡惨重。此役,第5支队共毙伤日伪军100余人,成功收复来安县城。这是第5支队挺进皖东敌后的第一仗,首战告捷,士气大振。

二打来安城,夜袭出奇兵

同年11月,为建立皖东抗日游击区,第5支队遵照上级命令,在罗炳辉的率领下,从来安转移。日军一部和伪军一部共400余人,赶来安县城空袭,又偷偷摸进来安城。为突袭第5支队,消耗我有生力量,敌军将主力撤至距县城10余里的百石山设伏。

罗炳辉根据侦察到的情报,对我力量进行比较和分析,提出趁敌主力外出,夜袭来安城的作战方案。他指出:“敌人虽然占据着地主豪绅的深宅大院,但他们对周围情况不熟,而我军则可依靠人民群众和本地战士熟悉情况,深夜拆开城墙,从暗道中进入敌心脏,给它来个中心开花。”这一方案,立即得到支队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。

按照罗炳辉的部署,第5支队一部于深夜绕过百石山,避开伏兵,直捣来安,出其不意地歼灭城内日伪军一部。接着,第5支队在城外痛击从百石山来援之敌。日伪军被内外夹击,不得不弃城而逃,第5支队重新收复来安城。此次战斗,第5支队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。

新四军三打来安城

■胡遵远

郑贤杰 王之龙

三打来安城,火攻敌胆寒

1940年5月27日,对津浦路东地区“扫荡”的日伪军1000余人,趁第5支队南下之机,第三次进犯来安,准备抢夺夏收的粮食。这次敌人准备了30余辆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,并携带野炮2门、山炮4门、迫击炮数门、掷弹筒30余个、轻重机枪20挺。敌人一到县城就强迫民工赶筑工事,架设铁丝网,做长期占领来安城的准备,企图以来安为据点,继续东犯,“扫荡”我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——半塔集。

罗炳辉决定在敌人立足未稳之际,予以痛击,消灭日伪军,保卫夏收。为达到预期目的,第5支队制订了作战方案:以第8团1营、2营和第10团1营负责攻城,第8团3营和特务连在来安至百石山及来安至新集之间设伏,以阻击由滁县方向来犯的增援之敌和堵截由来安城溃逃之敌。

28日夜,攻城各营轻装疾进,抵达来安城郊。29日1时许,第8团1营首先从城西北角突入城内。紧接着,第8团2营和第10团1营相继攻入城内,对守敌展开总攻。日伪军遭到突然打击,晕头转向,仓促应战。日伪军边打边撤,随后退至几个四合院里顽抗。由于四合院周围筑有又高又厚的围墙,加上第5支队没有火炮,使得我攻城部队久攻不下。

眼看天快亮了,第8团1营的战士们急中生智,在炸药包里塞进硫磺,或将炸药包外面用破布、稻草捆扎,然后浇上煤油,投入敌阵后爆炸燃烧。这种火攻的办法很是奏效,并迅速传播到其他各营。转眼工夫,日伪军占据的院落火光四起,烈焰腾空,瓦片乱飞,墙倒屋塌。敌军在火焰里,争相逃命,有些刚冲出火场即被击毙。就这样,日伪军长期侵占来安城的计划,随着这场大火灰飞烟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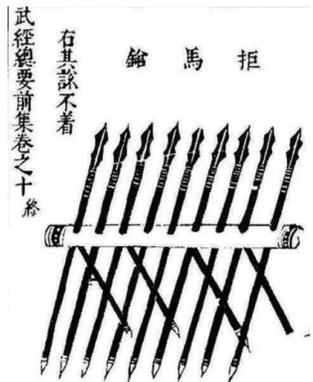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,滁县增援之敌在百石山遭我援部队截击,损失惨重。此次战斗,第5支队共歼敌200余人,打破日伪军“扫荡”半塔集的企图,鼓舞了民心,大振了军威。

战后,第5支队各部在津浦铁路南段展开破袭战,拔据点、炸铁路,连续袭击乌衣、担子街、滁县、沙河集、张八岭、嘉山等据点。百里铁路线上,战云此起彼伏,相互呼应,粉碎了日军的抢粮计划,也有力配合支持了津浦路西军民的“扫荡”斗争。

新四军五支队的支队长以上干部合影



罗炳辉与新四军第5支队第8、第10团营级以上干部合影。资料照片



《武经总要》中的拒马枪。资料照片

在上篇中,介绍了小巧便携、可机动灵活布防的铁裹囊及其常见的衍生器械。在漫长的古代战争史中,古人还研制出其他类型的障碍类器械,如专用于守城的塞门刀车、适用于守城和野营布防的拒马枪和鹿角木,以及兵马对战中广泛使用的绊马索等。本篇,我们简单介绍几款经典的障碍类器械,展现古人在军事防御领域的智慧与创造力。

古代攻城守城作战中,木质城门始终是城墙防御中最薄弱的环节,因此成为攻城方集中进攻的重点。当城门遭到破坏时,守城士兵会立即推出塞门刀车。该车作为障碍类器械可快速堵住城门缺口,阻挡敌军突入,同时为调集预备队或组织火攻争取时间。塞门刀车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,《墨子》守城篇中已有其用于城门防御的记录。至宋朝,《武经总要》以图文并茂

城寨拒敌显奇效

——中国古代障碍类器械(下篇)

■曹波

的形式记录了塞门刀车的形制结构:采用双轮木制车体,宽度与城门相当,车前侧有一多层木架,每层均密布尖刃,车尾设有供士兵推行的长辕。实战中,当城门被攻破时,守军会迅速集结数十名士兵推动塞门刀车封堵缺口。这种设计既能抵御敌军冲锋和箭矢攻击,又能利用车体利刃杀伤敌方人马,同时掩护己方弓箭手躲在其后对敌进行射击。在北宋太原保卫战中,宋军曾用塞门刀车进行阻敌。靖康元年,面对金军西路统帅完颜宗翰的大举围攻,太原守将王禀率领军民展开殊死抵抗。当金兵填平护城壕沟发起总攻时,宋军立即出动数十辆塞门刀车封堵城门缺口,同时调集抛石机轰击攻城器械,有效迟滞金军进攻。

塞门刀车是专为城门失守设计的应急防御装置,能在破城瞬间快速封堵缺口;而在更外围的防御体系中,守城方通常会在城墙与羊马墙之间设置“拒马带”,即通过密集部署拒马来阻滞敌军骑兵和攻城器械的快速推进。拒马的雏形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,是各种带有尖刃的网架式防冲击器械的总称,起初多为尖木或简质的木头加削制而成,后逐渐实现与矛、枪等兵器的融合。至春秋战国时期,拒马已作为常规障碍器械广

泛应用于战场,常横置于营门、要道等关键位置,当时被称为“锐盾”。《墨子·备蛾傅》篇专门论述其战术用法,足见其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。

至宋朝,拒马类器械的形制发展已较为成熟,《武经总要》详细记载了3种典型制式。其一为拒马木枪,以3支双锋枪为主体,通过铁索从枪杆中部固联,作战时可呈正六轮辐式展开形成障碍带,运输时则能收束成捆。其二为鹿角木,采用带有锐角的长坚木(形似鹿角),插入土中1尺有余,布设范围可依地形灵活调整,可有效阻挡骑兵突袭。其三为拒马枪,以周径2尺的圆木为基座,在圆木凿上若干孔洞,一侧以长枪穿孔而过并以枪柄支地,另一侧则用四五根支撑杆装于圆木上支地,使拒马枪的横截面呈人字形张开,枪锋直指敌方向,再以铁链固定于地面,阻止敌军人马通行。《宋史》记载的宋金倾巢之战中,宋军正是凭借深扎数尺的拒马枪阵,成功阻滞金军铁骑夜袭,配合弩矢齐发射溃敌军。这类器械兼具机动性与适应性,成为古代营寨防御与城池守备的重要装

备,当与护城河、壕沟及沟底竹签等设施协同部署时,更能形成立体防御体系,大幅延长守军杀伤敌军、摧毁攻城器械的战术窗口期。

除上述障碍类器械外,古人还发明了一些更为简易且有效的野战用障碍类器械,如绊马索和马拖。绊马索多用于伏击敌人,通常预先布设于交通要道,当敌骑兵疾驰而至时,埋伏在两侧的士兵迅速拉起绳索,使战马失蹄、骑士坠地。另一种类似绊马索的器械“马拖”更具杀伤力,其绳索一端编成活套,另一端固定铁枪,一旦套住马足,马匹继续前行便会拉动铁枪自戮马腹,从而实现了对骑兵的致命打击。

随着火器诞生和普及,以及传统骑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城防作战和野战的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,导致大多数传统障碍类器械被淘汰。然而,拒马类器械因其独特的防御功能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。从近代战争的堑壕防御到现代军事据点的布防,甚至在社会维稳行动中,我们依然能看到经过改良的拒马装置被广泛应用。



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